

閩鐸聲聲

孙绍振主编

问道语文

王立根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梦山书系

聞鐸聲聲

孙绍振主编

问道语文

王立根 著



梦山书系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道语文 / 孙绍振主编; 王立根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12

(闽铎声声)

ISBN 978-7-5334-8291-6

I. ①问… II. ①孙… ②王…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4769 号

闽铎声声

Wen Dao Yuwen

问道语文

孙绍振 主编 王立根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16736 83716932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晋安区福光路 23 号 邮编: 350012)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0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291-6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总 序

孙绍振

去年，为纪念福建师大 110 周年校庆，文学院决定出版一套“闽铎声声”丛书，计划从毕业于福建师大文学院、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名师中，选录一部分人的著述辑成，并命我为丛书作序。我欣然应命。我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许多研究，就是从语文教育实践中获得灵感，并希望回到实践，服务于实践的。第一批入选的七位作者的许多文章，我过去就曾看过，其中四位的著作（有二本就是入选本丛书的），我都曾作过序。

我在给陈成龙的个人著述所作的序中说过：“一个教师，即使他被评为特级教师，被评为名师，但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这名师也是名不副实的。”我还说：“可喜的是，陈成龙的许多论文都能很自信地亮出自己的教学理念。”我以为，这些话，正可以作为本套丛书总序的宗旨。

陈日亮先生的理念就是“我即语文”。十几年前，我就为日亮先生的大作《我即语文》作过序，今天看他的《知困者言》，印象最深的仍然是其“我即语文”。“我即语文”就是他和王立根等老一代名师，力挺钱梦龙先生力主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就是旗帜鲜明传承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特别赞赏他就此提出的“落差”理论，认为教师所教的与学生所学的应该有一种“落差”，课堂才会如水之于电那样产生“有用功”；如果二者等同，没有落差，教学效果等于零；如果落差达到一个“峰值”，就可能出现最佳课堂效果；如果越过这个峰值，导致学生不理解，教学效果也可能等于零。我当时在《我即语文》序中说，就当时的教学现状，主要危险不是落差过大，而是落差严重不足，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教师的文

本分析能力。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当然有所改观，但问题仍然是突出的。所以在《知困者言》中，他再次对“我即语文”做了阐述，其中一条说：“语文教师既要用语文育人，更要以语文修身”，这也是他历来主张的。他身体力行，自己动手解读文本，为此出过一本解读专辑《如是我读》。此次的《知困者言》，一半的篇幅又都是具体课文的解读、细读，大约有二十多篇。“我即语文”还昭示语文教师首先自己要懂语文，用《知困者言》中的表述，就是语文既是教形式的，也是教内容的，但归根结底是教形式的，要“因文悟道，因道学文”，即从语言形式进入内容，然后再从内容回到形式，得走一个来回，而且不止一个来回，“形式—内容—形式”不断往返，总归要回到“学文”。不仅要懂得语文学科和数理化学科的区别，还要懂得自己的国情、校情、班级情，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我在《我即语文》序中，曾花大量笔墨，阐述了陈日亮并不尾随当年风靡一时的所谓北欧对话模式，描述了他对当时出现的无效的多元对话如何痛心疾首，尤其介绍了他多次提出的“框子”说。他认为，这几乎是一个铁定的“框子”，无论你教什么和怎么教，都不能不顾及——四五十分钟一节课，五六十平米一间教室，五六十个学生群体，你只能在这被框定的舞台上活动，你不能“飞天”，你没有人家班级学生只有二三十人的条件（在小学，甚至减半），无法像他们那样，坐在交椅上，和学生从容对话，你只能站在讲台上，考虑你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由此，陈日亮进一步提出，非得你一言，我一语，才叫对话吗？只要交流存在，有声无声都应该是对话，一节课从头到尾，教师用启发式主讲，讲的内容合适，听的学生受用，理所当然应视为成功的“对话”。其实，这是有学术理论依据的，我在《我即语文》序中已经介绍过，我们常说的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就是无声的，就是隐喻意义上的交流对话；按美国的演讲学，演讲就是一种交流，就包含无声的心领神会，无声的质疑评判，听者当场一言未发，但日后可以在另一场合发表他的高见，所以，一个教师从头讲到尾，讲得很有启发，学生很有感应，就是精彩的对话。陈日亮还就语文的特殊性角度，进一步认为，语文能力的养成如果主要靠课外“习得”，那么，每周仅有的三五个钟头的课内“学得”，以接受性学习为主，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教师的讲授，应该是能使学生很有感应的启发式讲授。陈日亮甚至更进一步不止一次发出

呼喊，能不能一堂课将文本讲到底，作为考核青年教师的一个准则？然而他发现，很可惜，并不是很多青年教师都过得了关。我认为，这就是基于国情，基于当下现实，基于语文学科特殊性的考虑。无疑，语文课堂并不是只有一种教学模式，今后我们的条件改善了，班级学生少了，也能出现学生发言机会更多的语文课堂对话。但就今日现实而言，练就教师精彩的讲解能力，恐怕尤为急迫。故其《知困者言》所收录的2016年的“语文阅读教学的‘教’与‘不教’”演讲中，对他多次批评的两种极端现象，再次提出了批评：一是引述了我形容过的“所问肤浅，所答弱智，热热闹闹，空空洞洞”，批评了虚假无效的对话；二是说他经常去听课，坐在教室后面，观察学生听课的反应，发现有的学生听着听着就伏在桌子上，脖子变短了，甚至没了脖子，趴在桌子上休息去了，这样地讲，同样是没劲的。近期，我就多次宣传陈日亮这个观点，许多教师一节课都讲不下去；实际上，哪怕半个小时，十五分钟的精彩演说，都并非轻而易举，都值得我们许多教师努力去训练。

王立根先生的核心理念是“作文智慧”。这绝不是说立根先生不重视阅读教学和文本解读，后文中，我将另以专门介绍。这里，先就读、写间的辩证关系，借此机会，我做点强调。

我给本套丛书入选之一的郭亚丹的《守正·出新·突破·超越——中学语文教学耕耘录》作序时有一段话：“我曾经说过：‘说到阅读，这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问题最突出的一环’，‘作文和口语的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语感不能离开阅读的实践’。郭亚丹的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论证了‘阅读与写作是相辅相成、无所谓轻重的’。他说：‘从现实生活来看，任何人都是阅读比写作多得多的，生活中的多数人一生中写作量相当少，即使是以写作为专业的作家，应该也是阅读比写作更多的。’这当然是事实。基于此，郭亚丹认为，‘写作永远也取代不了阅读，阅读是生存必须掌握的一种本领’。这样的领悟，显然透露出郭亚丹自身成长经历的体会。而当他把这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之后，就有了理性的高度。把阅读提高到生命存在的一种必需，这样的真知灼见，本身已超越了语文教学。”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对郭亚丹的命题作出这样的肯定，一是我大概觉得我有这样的“资本”。许多人都知道，我是从文学创作论进入文艺学的，我的学术生命的奠基之作和发

轭之作就是《文学创作论》，我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解读文本，介入语文课改的，我文本解读的核心观念就是揭示作品的创作奥秘。我大概也算一位作家，多种文体都尝试过，发表过，幽默散文尤被一些偏好人士推崇。总之，就我的身份肯定阅读的不可替代性和普及性，大概更有说服力些。二是，多年前，针对一些极端的争论，我比较公允地说过：“我们自古只说读书人，没有说写书人。”在学术争鸣中，我自认自己一向观点尖锐鲜明，不搞骑墙折中，但同时主张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我历来认为，语文能力的最高体现是写作，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如何，最重要的检验是写作，我理想的语文高考，应该是以作文为主，与其用似是而非、纠缠不清的阅读题考学生，不如好好地出一篇作文考他们，当然，改卷者也要认真地改好。但是，对于最大多数学语文的人，我们不仅不可能要求他们都成为作家，也不可能企望他们个个毕业后都会写一手较漂亮的文章（还只是某一种文体，会写诗的不一定会写公文，会公文的不一定会诗），甚至不可能希望他们都热爱写作（某种意义上，写作是最艰苦的劳作之一），而要求学生普遍地热爱阅读，爱读经典，在爱读的同时会读，则是可能的。物质生活之外，追求精神生活，填补精神空虚是人类的天性，而阅读，尤其是愉悦的阅读，特别是当今非纸质文本阅读、跨文本阅读的广义阅读，几乎就是现代人的天性。但是，一则，作为语文教师，不能因此降低写作的定位，相反应永远抱持理想，以文学的理想、诗意的写作引导青少年学子，这无论何时都是文学教育永恒的课题，即使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实用角度，也值得如此施教，何况，阅读经典，可能还有其他人文学科可替代，而写作能力之培养，唯语文学科要承载，非他人可代劳；二则，从当今社会人际交往的实际需要看，写作，包括口头表达，尤其是论辩性表达，也越来越重要。

总之，看问题要全面辩证，形成特色又必须有所侧重，我在肯定郭亚丹重点突出阅读时，就特地补了一段：“对于作文教学的必要性，其回答是肯定的。肯定之后还有建设……”具体的内容，我就从略了，大家可以看我的序和他的书。我还说“每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而风格就是片面的，丛书中七位作者，都是因“片面”突出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了他们独到的风格，但从他们的著述看，他们的教学实践又都并未走极端。再则，人

们阐述问题，往往会针对论题的需要，此时强调某一点，彼时又强调另一点，我也并不例外，读者对一个人观点的判断，也应该全面去看。

现在回到王立根。立根先生的《作文智慧》一书十五年前面世时，我就应约写过序。序中，最重要的，我说了三点：第一，“我特别欣赏他始终把语文教学的重心放在作文上，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个中理由，前文已做阐述。第二，“许多语文教师之所以不重视最应该受到重视的作文，除了受到高考客观题的震慑以外（当时客观题的过重比例，已经引起公愤），还因为，作文和知识传授不一样。知识传授可以用大工业的方式，一个老师就能应付数十个学生，而作文教学只有用手工业的，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式最为有效”。因而，我又特别赞赏其《作文智慧》不是去建构那种吓人的、系统的、复杂的所谓“作文原理”，而是提供了大量的个案，一共有200例，并且不是案例堆积，我当时说：“立根先生善于从具体个案的分析中作触类旁通的点拨。这种点拨正是从感性上升到智性的桥梁。”我当时举了一例，个案中有一则写母亲的习作，小作者笔下出现了一位娇滴滴的少妇妈妈，文章最后说：“拜托你，快快成长起来吧，亲爱的妈妈！”我当时说，光是发现这篇好作文还不算真正完成一个语文教师的任务，更高的层次是对之加以点拨，王立根是这样点评的：“在都市里，我们不是经常会遇见这种少妇形象吗？只不过从来没有一个女儿对她的妈妈这样写过。”我在序中接着说：“在生活中经常遇到，并不需要什么水平，而敢于、善于把它写到作文里，则是需要水平的。”我还说，阅读经典，使我们大开眼界，但是，重复大师名家，则是用自己的嘴唱别人的歌，冰心写过母爱、母亲，而小作者写出了和冰心不一样的母爱、母亲，因而是别开生面的。因而王立根的全部作文教学就是善于开启孩子自己的心灵体验。书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第三，“王立根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孩子的经验层次，光是贴近孩子的经验，完全离开成人的文化创造，可能是作茧自缚”。正是基于这一点，立根先生在《作文智慧》中又提供了一系列和当代作家、教授的对话，包括采访谢冕、曹文轩、叶永烈、高洪波、张晓风、江浩、北村、梁小斌等多位著名作家的实录。于是，两个系列，一个是少年儿童的习作及其评点个案，一个是成人名家的访谈个案，由此构成了这本《作文智慧》的奇异特色。本次组编丛书，立根先生提供的是

《问道语文》，我想就此也补充三点：第一，《问道语文》面更宽，不限于作文教学，阅读教学、文本解读、课改、高考等都有涉猎，但通观全书，一半多的篇幅、最大的篇幅，仍然是谈作文教学、作文智慧，其中，《作文智慧》原书中的重要篇章，包括上述作家采访录的几乎全部，都收入现在的《问道语文》中，可见王立根的核心理念、特色风格，仍然是“作文智慧”。第二，钱梦龙先生说《作文智慧》的书名起得好，我以为，好就好在“智慧”两字，好就好在书名与内容名实相副，正如立根先生自己说的，孩子们点点滴滴、火花闪烁的智慧之星，作家们真知灼见、汨汨奔涌的智慧之泉，把它们贯串、排列起来，可以使读者领悟出许多写作的规律。这就是王立根的智慧。第三，最值得补充的是实践之检验。许多冠以“作文法”“作文教学方法”之类的书籍，之所以无效，不仅在于其内容可能枯燥无味，更在于它可能未经实践检验，而王立根先生以他《作文智慧》内容所进行的施教，数十年间，他培养的中学生，竟有数十人次获得全国性、华东六省一市、福建省等学生作文比赛大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其“作文智慧”理论最有价值的。今年四月份，他从教数十年的福州三中与福建省语文学会联合主办了王立根作文教学研讨会，会议邀请我出席，我恰逢在外地，否则，我一定到会，说说我的上述感悟。

许更生先生，可能是我省中学语文界发表文章最多的名师了，从他书中的材料看，有400多篇，他还出版过多部著述，甚至富有余力，著作广及莆田地方文化。许先生从自己的实践和研究中上升出的理念就是“以词汇为核心、以‘联词组段’作为课堂改革的强力抓手”。这无疑是富有特色、别具一格的。他在他的《解语索文》论著中，主要做了五方面的论证和阐发。其一，中学各学科，主要是学内容，唯独语文课本，主要教学目的不是指向课文内容本身，而是构成这些内容的语言材料及其建构方式，即所谓“更重要的还在学习语言，接受新的词和句式”。语言文字虽不是语文教学的全部，但肯定是语文学科的“核心知识”，是语文教学“个性特征”之所在。其二，当代脑科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人类口语和书面语的学习是两个不同的运作过程。人类的口语是几百万年的大脑积淀遗传的自然产物，其中“文化继承单元”（又称“敏因”）起主要作用，依靠口传耳受的“唤醒”和“激活”

便可“习得”；而只有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却非得下苦功不可，从一个一个字词开始学习，主要是从名家名篇学习和模仿典范、优美、高雅的书面语词。其三，书面语的“学得”，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首先还是靠记忆和模仿，从积累和运用词语入手，再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错误”才可能正确掌握。从“会说”到“会写”，需要质的转化或飞跃。要想从能说会道转化为笔头过硬，一要靠文化素养，二要靠表述能力，三要靠文采训练。想不经艰苦练笔就从嘴灵自发地跳到笔灵，那是不可能的。其四，究竟必须掌握多少词汇才能基本“达标、过关”呢？当代众多学者借助电脑统计等手段提出：必须识字 3000，掌握词语近 9000。许先生提供了其他著名特级教师、专家学者研究得出的不同词汇量的数据。他自己研究的结论是：1 万个左右的典范、优美、高雅的书面词汇。其五，他特别以此运用于指导莆田地区的中考、高考，以有关的成绩说明其“以词汇为核心、以联词组段为强力抓手”理念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许先生的理论和理念同样是实践检验的产物。作家的创作，学生的习作，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个字词，我的《文学创作论》里有专章论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我的《文学文本解读学》也专门提出了关键词语解读法。我以为，许更生先生“词汇核心、联词组段”说，与陈日亮先生的最后落到形式，王立根先生的作文智慧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还认为，他们的实践型研究，对我多年的理论学术建构也是有力的支持。

陈成龙是我到福建师大后的第二届学生，俞发亮、郭亚丹、赵艺阳是改革开放之初，1977 级（俞、郭）、1979 级（赵）的学生，都是我的学生，我就说简略一点。

陈成龙的教学理念是“真语文”与“智教”。针对“假大空”的课堂，他和他的同仁提出了“真语文”的口号，在《语文建设》发表后，引起了热议。“真语文”的内涵是什么？一时众说纷纭。陈成龙于是联系我国教学名师的教学实践，在《语文建设》又发表了《“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的融合》的近万字论文，认为真正的语文教学必须是“真知、真教、真学”三者的融合，如果缺了某一项，这样的语文教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的语文教学。我认为这一观点既鲜明，又符合语文教学的实际。比如，他用巴班斯基的“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这段话，阐明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法的关系，也就是三“真”中最重要是“真知”。这个观点与王荣生的“教什么比怎么教重要”，陈日亮、王立根都强调的“教学内容永远比教学方法重要”的观点，以及我历来主张的文本解读是最重要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作为实践中诞生的名师，陈成龙的许多名课、公开课，又以他的精彩设计闻名遐迩。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智教”说，见于他的《“少教多学”的关键在于“智教”》一文。他说的还是与“真知”的关系，但把那与之配合的“真教”，改为更有灵性的“智教”。其内涵就是“对文本的深入钻研和巧妙的教学设计，运用教育智慧，打造富有灵性的课堂，用尽可能少的教学时间切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学习兴趣的激发、学习方法的指导”。文中，举了他的《最后一课》教例。他利用课文中的插图，请学生以文解图，学生总结出了图中的小弗郎士眼神中包含着仇恨与懊悔的感情。接着，话锋一转，他说图中少了另一主人公韩麦尔先生，请大家根据课文内容，为韩麦尔设计一幅最精彩的画像。学生七嘴八舌，最后认为，最精彩就是画出他“悲情告别”一刻的表情，这样的活动，既有趣又到位。陈成龙的集子命名为《追梦灵性课堂》，我猜想，他意在既抓住文本的灵性，又力求教学设计的灵性。这也是他的语文教学理念，这样的理念同样很有新意。

俞发亮的核心理念就是他的书名：“议论文写作与理性思维”。写作的重要，尤其是人际交往和发展竞争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议论文写作及其相关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重要，不仅在前文中，我已阐明，过去也为此写过不少文章，几年前出版的《孙绍振论高考语文与作文之道》，主要就是讨论这方面内容的。俞发亮做出了他自己的系统建构、鲜活论述。一是，他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如，一则资料，受访者为高校教师。在“您认为高考语文应当考查的能力有哪些”的问题中，78.1%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考查“语言的逻辑能力”，远远高于其他应当考查的能力。又一则资料为：2017年在广东八所中学所做的问卷调查，778名学生受访者中，认为应加强对逻辑思维能力考查的占43.66%，也远高于其他能力。二是，他认为，写作教学的“序列”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教学难题。眼下我国中小学写作课可能是所有学科中最自由、散漫的一门课。认为绝对、封闭、不变的“序列”肯定行不通，然而，就班级授课制而言，在目前语文教师敬业精神、专业水平参差不

齐背景下，若没有适宜的作文教学“序列”，不少作文课难免走向随意、无序，从而导致低效、无效。并且认为，重要的是不能再停留于介绍、阐释陈述性知识（议论文“是什么”），而应当结合程序性知识（“怎么写”议论文），逐项加以训练。于是，他构建了他的“序列”，其书共四章，从“高中生议论文写作之意义”到“议论文写作起步——人格”，再到“议论文写作要务——分析”，最后到“议论文写作追求——深刻”。各章又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分为若干节，如最后一章的最后四节：“运用演绎、归纳：逻辑推理”“反弹琵琶求创新：逆反思维”“求同并善于求异：隐喻去蔽”“论证更严密周全：初步证伪”，既深得逻辑推理之要领，又结合了高中生的思维实际。三是，书中有大量鲜活的案例，许多是他近20年参加高考阅卷工作以及作为厦门市中学“教头”的实践心得，既富有说服力，又可读性极强。

郭亚丹，我前面已做不少介绍，这里着重补充他的理念。支撑其阅读教学核心理念就是“坚持文本细读，坚持微观分析”。关于微观分析的训练，我曾提出两个方面的原则：第一，对个别作品，主要从艺术形象还原，抓住还原出来的原生感性现象与经过艺术加工的作品之间的矛盾，提出问题。第二，避免孤立地分析问题，尽可能把作品放在可比较的语境中，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提出问题。而郭亚丹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出的语文阅读教学的三个层次，即学会快速提取信息和整体感知，学会深入分析和鉴赏的细读，学会审美阅读和创造性地阅读，可以说和我的主张相辅相成。而且，从以学生为本的立场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指导学生进行阅读教学的方法，包括品味语言，循着语言的路径追寻文本的意义；品味语言的用词、语境、表现手法，分析比较文本的意蕴，深入想象进行有创造性的阅读等等。如果说我在《名作细读》中主要是提供对名作微观分析的范本，意图通过这样的细读揭示其方法，而郭亚丹的经验，则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很强的可操作性。他在书中为此介绍的三个教学设计，也为我们提供了三个范本。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郭亚丹认为，提高教师文本解读能力是提高阅读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必要前提，更是课堂教学的目的。的确，“教师为主导”，教师首先应像郭亚丹说的，把自己提高到引领者的水平。郭亚丹担任龙岩二中校长多年，作为专家型的管理者，这无疑是他的切身体会。

赵艺阳的核心教学理念是“情感语文”。他在他的《教海拾贝》中，就此做了两方面的阐述。一方面，他认为情感语文是人文的语文，他说“没有情感的课堂是死寂的课堂，没有情感味的语文是死寂的语文。”他阐述道：一首首诗歌是人类情思的抒发，一篇篇小说是人类悲欢离合的述说，一则则寓言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一个个童话是人们心灵的倾吐；文章，包蕴了人们多少的情感；文章，凝聚了人们无限的智慧。另一方面，赵艺阳又同时认为情感语文是“工具语文”。他指出，离开了语文的工具性，情感语文则成了水中花、镜中月。他又进一步说，语文，一个词能生出情感之根，一句话能长出情感之叶，一段文能开出情感之花，一篇文章能结出情感之果；情感语文是扎根在工具语文这片沃土中的大树，根深才能叶茂，才能枝繁，才能花艳，才能果硕。我以为，赵艺阳“情感语文”观对于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辩证处理，是独到而又切合了青少年读者的心灵特点的。他并不像许多论者那样，拘泥于工具性是第一性，而是基于青少年富于感性、富于情感、富于想象、富于理想的血气方刚的心性特点，把更容易使少年读者有感觉，易切入的人文语文放在首位，甚至不惜可能带来的“片面性”，把他的整个理念命名为“情感语文”。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课堂是死寂的，其他的一切都可能是空谈。但是，赵艺阳又清醒地意识到，工具语文才是根本，所以，他又把工具语文比喻为“沃土”，情感语文只有把根扎在这片沃土上，才能根深叶茂，花繁果硕。赵艺阳是当年分省命题时，最早担任福建省高考语文命题组组长的新生代名师，我当时对福建的语文高考题目赞誉有加，现在回想起来，似乎约略可见他教学理念的早年风采。

如果要对七位作者的书稿做个小结归纳，我最想归纳的就是文本解读及其文本解读教学。我们正面临两方面的重大变革。首先是正在全面铺开的统编教材，大幅度增加了优秀作品，尤其是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量。有关专家正大力倡导海量阅读，倡导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好作品，用王富仁当年的话，就是“好文章一看就懂”；用歌德的语言就是“（表层）内容人人可知”；用我的语言，称为“一望而知”。我十几二十年前这样说，更重要还基于当年令人忧心如焚的教学实际，因为语文教师“面对的不是惶惑的未知者，而是自以为是的‘已知者’。如果不能从已

知中揭示未知——指出他们感觉和理解上的盲点，将已知化为未知，再雄辩地揭示深刻的奥秘，让他们恍然大悟，就可能辜负了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这就是我们语文学科和数理化学科的最大区别。如果我们仅仅提供了好文本，而没有进一步的揭示，没有形成如陈日亮说的“落差”，我们和学生无甚区别，我们就失去了主导者、引领者的责任，甚至成为毛泽东批评的“群众的尾巴”。而如何处理师生间已知、未知的矛盾，我在建构文本解读学的进程中，说过许多话，我自认为最好的说法是揭示文本的创作奥秘，我把作品比喻为苹果，人们手里拿到苹果，而其从种子入土，到生根发芽，浇水施肥，到长成大树，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不见了”，被苹果“遮蔽”了，如果光就苹果“阅读”苹果，一望而知的是，苹果是红的，甜的，最多加上是有营养的。这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可以说出来的，如果教师也仅限于此，何苦来教师辛苦一场？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揭示其“生成秘密”，换到文本，就是“创作奥秘”，哪怕揭示一二点也好。哪怕一部分经典文本能这样施教也好。果能如此，教师的权威树立了，学生的兴奋激发了，不仅带来阅读经典的二度快感，而且写作的秘密也发现了，读与写都各得其所，如此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我看丛书中的七位作者，都不同程度特别关注到了文本解读。陈日亮和王立根两位先生是介入最深的，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老一辈著名特级教师，他们当年靠的不是“软”论文，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评上特级教师的。我当年就解读说过的许多话，他们十分认同，现在他俩自选入丛书的集子里，都保留了许多当年就此的精辟论述，立根先生在引述了我的有关言论后，曾说：“忽视文本，不善解读，成了语文课最大的痛。”现在的状况，当然有不小的变化，但面临大量阅读的新形势，会不会再度忽视解读，产生新的“痛点”？但愿这是多余的担心。十几二十年前，由于立根先生的牵线，我深深介入了他和日亮先生主持的福建省语文学会的活动，与我省语文界的同仁结成了深厚的学术友谊，乃至与国内著名的于漪、钱梦龙先生有了许多学术往来。日亮、立根先生还参与了我主编的初中课标语文教材的编写，我们甚至形成了被学术界称为“闽派语文”的学术风格，这风格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文本解读，因为阅读的涉及面最广，一望而知，最具普及性，而又花时最多，效率又不见得最高，如能突破，也许我们的语文教学就

可能如上所述，产生一箭三雕之效。这是我省语文界的好传统，包括大学与中小学的紧密学术联系，包括文学院出版这套丛书，都是值得珍惜的好传统。发扬这些好传统，用以应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新形势，聚八闽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其次就是新高考这一新形势，有人夸张地说，现在高考拉分、高分看语文，甚至说，状元看语文。这当然不能全当真，但也不能全当假。如果在文本解读教学，尤其是揭示创作奥秘上有所作为，在如此大量经典名篇阅读的基础上，培养出读写尖子，尤其是出类拔萃的作文高手，不是没有可能的。

最后，愿闽铎声声，铎声悠远，铎声不绝。福建师大文学院的校友成千上万，分布于八闽大地，愿丛书入选更多的校友名师佳作，反哺于教学一线。愿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茁壮成长于“海滨邹鲁”的人文福地。

2018年8月7日

自序

王立根

语文是基础教育的精髓，忽视语文，教育就成了空壳，语文不仅仅是教读书识字的，它还是培育人的精神的，不重视语文教学，离开人文的滋润，基础教育就形而无神。

回想过去，语文教学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口号喊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外语教学、计算机教学又成了香饽饽，而语文长期停留在“少慢差费”（吕叔湘语）阶段，许多语文教师虽是孜孜探求教改之道，却收效甚微。只有到了今天，新时代强调了文化自信，语文才被认为是重中之重。中小学唯有重视语文，人才能立起来，才能登高瞭望，这是我们语文教师最感欣慰的事！

如今语文教师真是任重道远。教语文要教出生命的开阔、灵动、乐观、豁达、鲜亮，把语言文字的美丽与生动、语文世界的丰富与神奇、人类心灵的广袤与深邃，把智慧、文明、善良与爱传授给求知如渴的学子们。这应该是语文教学的追求。

过去我也写过一些语文教学文章，时过境迁，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今蒙母校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不弃，嘱我编辑成册，忝列福建教育出版社“闽铎声声”丛书之一，给青年教师一点启发思考。这些旧文章多曾发表过，因借此修订，自署为《问道语文》。我年近八旬，母校能为当年的学子出一本专

著，感愧交集！

“问道语文”意思是探究语文的本性，是否达意，至今思之，仍惴惴不安，分三个部分：“独语”“对话”“点赞”，自信皆为自得之言，虽不能做到“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于人”，唯望此书能与语文界同仁们同参正觉，同登正道。

2018年5月